

The "Public"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Shanghai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日] 小浜正子/著 葛涛/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



The "Public"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Shanghai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上海史研究译丛

[日] 小浜正子/著 葛涛/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日)小浜正子著;葛涛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
(上海史研究译丛)
ISBN 7—5325—3580—0

I. 近... II. ①小... ②葛... III. 社会结构—
研究—上海市—近代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5679 号

小浜正子
近代上海の公共性ヒ國家
研文出版 2000 年
本书据日本研文出版社 2000 年版译出

上海史研究译丛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
[日]小浜正子 著
葛涛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8 $\frac{8}{18}$ 插页 5 字数 340,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100
ISBN 7—5325—3580—0
K·531 定价:3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64063949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点学科项目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张仲礼 陈 绛 魏斐德(美)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军	马学强	卢汉超(美)	叶文心(美)
叶凯蒂(德)	毕可思(英)	安克强(法)	张晓敏*
周 武	周育民	高纲博文(日)	梁元生(香港)
熊月之*	黎志刚(澳)		

有*者为执行编委

执行编辑: 张晓敏 吕 健

本书责任编辑: 谷 玉

美术编辑: 黄 琛

技术编辑: 富 强

上海这座城市，既饱经沧桑，给人以复杂的历史感，又生机勃勃，给人以常新的时代感。用得着一句老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上海史研究，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海外学者更是情有独钟。即使不算一百五十年前麦都思对上海历史的简单描述，也不算稍后麦克莱伦的《上海史话》、裘昔司的《历史上的上海》，单从 1921 年、1923 年寓沪英国学者兰宁、库寿龄共同推出的功力深厚的两大卷《上海史》算起，海外学者对上海史的研究已有 80 个年头了。尤其最近二十多年，海外上海史研究更明显呈现“四多”，即项目多、会议多、成果多、人才多。在美国，西部伯克利、洛杉矶、俄勒冈，东部康乃尔、哈佛，北部密西根，都各有学者在研究上海史。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我国的香港、台湾，也都有学者在从事上海史研究。日本有上海史研究会之设。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因研究上海史人多势众，在美国学术界曾有“上海帮”之谑称。

上海史已是海外汉学界公认的热门话题，堪称显学。

海外学者究竟发表过多少关于上海史的著作，难以确计。据不完全统计，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德、法、英、日等国关于上海史的博士论文已有不下三百篇，正式出版的上海史著作不下五十部。

上海史是内蕴极丰的富矿，开采眼光、冶炼技巧因人而异，其产品自然也多姿多彩。有的对社会史、文化史感兴趣，有的对政治史、经济史感兴趣；有的纵贯古今，有的横跨多门；有的以资料翔实著称，有的以议论充当见长。他们共同构成上海史园地的繁盛景观。

上海史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翻译海外上海史研究成果是上海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城市史、近代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学科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上海史研究译丛》遂应时推出。

本丛书所选各书,是我们接触到的优秀著作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书颇具价值,但或因已有中文译本,或因翻译版权联系未妥,未能列入。遗珠之憾,尚望鉴谅!

本丛书编委会成员除了上海的学者,还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香港的学者,他们都是上海史研究专家。在《译丛》组织出版的过程中,他们帮助推荐作品、联系版权、校订译文,付出了很多劳动。

本丛书具体翻译工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

张仲礼、陈绛、魏斐德(美)三位著名学者多年从事上海史研究,欣然担任《译丛》顾问,帮助规划全局、解决疑难问题,使丛书增色不少。编委会特此表示感谢。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序 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上海史研究在海外中国学界备受重视,课题丰富,会议频仍,人才辈出,佳作迭现。截至 2001 年,西文世界以上海史为博士论文者,竟超过三百人,复复驾乎关于中国其他城市研究成果之上,谓之显学,洵非过誉。

海外上海史研究群体中,日本学者自成特色。作为上海史研究重镇,美国伯克利、德国海德堡、法国里昂,各有承托研究群体的实体,或为东亚研究所,或为中国研究中心,荟萃资料,聚拢人才,申请经费,承接课题。日本则不然,无论东京或京都,本土或列岛,都没有一个上海史研究人才相对集中的大学或研究所,但他们照样搞得有声有色。考其原因,关键点,就是日本有一个上海史研究会。这也是日本人团队精神的体现。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成立于 1990 年,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学术团体,由日本各学校、研究机构中对上海史有兴趣的学者自愿组成。他们自筹经费,自立课题,自办读书会、研讨会,发表论文,出版书籍,十多年来,从未间断。其灵魂为会长古厩忠夫先生,中心人物之一即本书作者小浜正子博士。

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公共领域或曰公共空间问题,成为国际学术界许多学科的热门话题。20 世纪 90 年代最初几年,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的国际会议,几乎每会必议,每议必争,从哈贝马斯定义的内涵、外延,到中国资料的取舍、诠释,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这方面的成果相当可观,有讨论汉口商人作用者(罗威廉),有探索浙江地方士绅作用者(兰金),有研究同乡组织者(顾德曼),有研究由报刊而出现的中间地带者(季家珍)。本书的选

题,自与这种国际学术背景有关。

我对本书最为赞赏的,主要还不是选题,而是研究方法。作者没有从诠释、演绎“公共性与国家”的概念出发,而是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上海慈善机构、救火会等团体的深入研究,溯其源流,述其沿革,析其功能,探究这些团体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如何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作用,论述上海社会公共性与公领域的特点,最后令人信服地说明,慈善机构、救火会这类社会型联合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公共性,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的产物,内涵相当丰富。这种从历史的自身逻辑出发而不是套用流行概念的方法,得出的结论,让读者感到实在、可信。

日本学者治中国学,在穷尽史料、缜密考证方面,每每令人叹服。这一特点,在本书中也有突出反映。慈善机构、救火会资料,本来比较零散,对于外国学者更加难以寻觅。小浜博士探幽索隐,沿波讨源,查报纸,翻档案,终于清晰地勾勒出这两大团体的历史脉络,其功夫之深,令人赞叹。

我初识小浜博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她在复旦大学进修,一边读书、一边带孩子,还要挤时间查档案,做研究,常常在沪东、沪西之间来回奔波,横穿大上海。这种对学问孜孜以求、乐在苦中的境界,每一个了解她的人无不佩服。其后,我们历史研究所与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多次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几乎年必一聚,我经常读到小浜博士的论文,对她的研究课题和学术见解有比较多的了解。《上海史研究译丛》酝酿选题时,我立刻推荐了她的大作。值此研究上海史的力作在上海出版之时,小浜博士索序于我,我自然乐而序之,并为此感到十分荣幸。

熊月之

2002年11月12日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序 言

在使中国近代史变得明了、清晰这一点上，上海史是一个关键的研究课题。其关键性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所有的领域，而小浜正子则将焦点特别放在了“社会”上。她使用了一系列“征信录”的史料，这在迄今为止的上海史研究中尚未得到完全充分的利用，由此她十分成功地描述了慈善事业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与近代史相关的史料方面，上海史也具有关键性。与上海史有关的史料，并不只是用于研究上海史，也是研究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料。在此我想加以介绍的《上海医院第一征信书》虽然并不起眼，但也属于其中之一。

我从1984年1月至3月，在上海博物馆对征信录进行了集中调查，当时看到的一份征信录便是《上海医院第一征信书》。这批原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史料现在移交给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因此该征信录现在也应存放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上海医院据认为是中国历史上首家由中国人独自经营的近代化医院。不过，它是否确实为“首家”，还有待进一步加以研究。可以确定的是，上海医院在中国医疗制度史上开创了先河，另一点十分关键的是，至少这家医院的创立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在经营上展现了很大的气魄，这位创立者就是李钟珩。

李钟珩即李平书，咸丰三年（1854）诞生于江苏宝山（现上海市宝山区）。他在历任广东、湖北省的地方官之后回到上海，当地方自治机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诞生时，他就任第一代总董。他是

一位致力于上海租界以南的南市的近代化、在本书《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中也数次出现的知名人物。

我认为李钟珪是非常富有魅力的人。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有许多像他那样富有魅力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正是在这个时期,上海终于成为中国的中心,并且由于对世界开放,像他那样有魅力的人在这里会有各种各样的会面。李钟珪的自传《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中记载了他与各色富有魅力的人物的会面,其中的一人便是张竹君,她作为“中国首位女医生”而闻名。

张竹君原为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人氏,出生于光绪五年(1879),比李钟珪大约年轻二十五岁。她虽然生在一个优裕的官宦家庭,但年幼时就患了脑筋病(也称脑经病,大概是小儿麻痹症),拯救她的是美国传教士嘉约翰(John G. Kerr),他同时也是一位医生。由此她知道了西医(欧洲医学)的长处,因此在广州的博济医局学习了整整十三年。嘉约翰因她而感到十分骄傲,并授予了她医学的毕业证书,张竹君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女医生。日语中有“快男儿”,却没有“快女儿”的说法。但是如果有“快女儿”的话,几乎只有她才称得上。马君武在《女士张竹君传》中,称她为“中国之女豪杰”(《马君武集》第1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她作为“快女儿”、“女豪杰”,以及根深蒂固的“革命儿”的风采,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收录的《女医师张竹君》中有着生动的描绘。

张竹君开始出现在上海史中,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而张竹君与李钟珪的初次会面,也发生在这一年的10月下旬。那一天,同为海上名士的姚文枬来到李钟珪办公的上海制造局拜访,谈话中涉及到张竹君在公共租界创建的育贤女校(育贤女学堂)。该校的成绩颇佳,姚文枬的女儿也在该校就读,只可惜由于经费不足不久就要被迫关闭。李钟珪动了心,与姚文枬一起赶赴该校视察,正巧遇上了一大群逼债的债主们,房东因为房租已经拖欠了三个月,大声吵嚷着要“在校门上钉钉,关门了事”。正当李钟珪与房东以及债主们交涉,答应代为还债,终于使惶恐不安的学生们安下心来时,为筹钱而四处奔走的张竹君回来了,两人就这样见了面,时年李钟珪52岁,张竹君26岁(《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

翌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张竹君的帮助下,李钟珪创立了女子中西医学堂,开始着手培养、教育女医生。李钟珪本人对中医造诣颇深,因此他亲自教授中医,张竹君则教授西医。女子中西医学堂附设女医院,在此基础上,宣统元年(1909)六月,中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医院——上

海医院在南市诞生了。

在《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分别有关于李钟珏和张竹君的略传。此外,关于他们还有若干简单的传记。李钟珏因有自叙,我们尽可以详细知道他的生平情况,而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快女儿”和“女豪杰”就了解得很少了。而通过阅读《上海医院第一征信书》,我们可以了解到迄今尚未被加以介绍的两人的活动,特别是张竹君的事迹。《上海医院第一征信书》出版于宣统二年(1910),即上海医院诞生一年的时候。虽然称之为“征信书”,实际上与征信录是完全相同的,《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中也记载为《上海医院第一征信录》。无疑李钟珏本人进行了“征信书”的编纂工作,其中收录了他作的《上海医院第一征信书序》以及当时他所作的演说,还有上海道蔡伯浩观察颂词,这些也都一并收录在他的自叙中。

《上海医院第一征信书》中登载了上海医院的正面以及女医学堂的照片,无一不给人留下壮观的印象。此外特等(头等)病房、二等病房也十分齐整,三等病房也给人留下了清洁的印象。担任医院董事的除李平书(钟珏)之外,还有虞洽卿(和德)、王一亭(震)、沈缙云(懋昭)、莫子经(锡纶)等当时的上海名士。育贤女学堂的学生们在医院的落成典礼上演唱了赞歌,共分为三段,这里抄录了第一段以及结尾部分的歌词。

贺上海医院落成歌

(一)

嗟乎东方病夫	何日起沈疴
睡狮鼾昏不醒	国兮奈若何
土地将成剖解	安有完全肤
国脉日见衰促	谁能驱病魔
美哉上海医院	今日观厥成
愿仗医国圣手	针砭我国魂
大家瞻仰歇浦滨	上海医院巍然新
落成今日共贺庆	仁慈事业救斯民

育贤女学堂是由张竹君担任校长的女学校,此外从她发表的演说以及其他一些言行来看,她本人是这首歌的词作者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以下将介绍一部分“征信书”中记载的有关她的逸事。上海医院的医师分为中医和西医,主任西医是德国人克利医生,常驻西医是王维廉与张竹君

二人,张竹君还兼任监院,也就是事实上的院长。

张竹君作为医生的献身精神,李钟珏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昔年张女士为西门内张姓收生,至夜半不下。察其产情,非用刀割产门,胎不得出。时随诊之女学生程度未至,必求专门名家,帮同举手。告之病家,乃亲往罗医生处,适避暑不在沪。急坐人力车至虹口,叩克利医生之门。克利已卧,起而询其情,立唤汽车,偕至西门,徒步入城,时已丑正。于是克利在上,用哥罗方闷药(麻醉药),张女士在下奏刀,而呱呱者得出,母子平安。比事藏出城,已黎明矣。

这是她作为妇产科医生的活动情况。而作为精神科医生,对于她还有以下的记述:

妇女之患疯狂者,室家乃为大苦。每见疯妇,蹀躞在途,不知人事,良用惻然。开院后,有疯妇在马路滋事,由工程局送至医院,商之张竹君女医士,慨然留治。乃不旬日,而病势大减,日就安静。此例一开,闻风而至者不绝,一年中治愈疯妇九人。惟病房偏仄,疯妇无端哭笑,扰及病人,良多不便。因于西首建添疯病房一所,于庚戌五月落成,可容疯妇十四人。张女士善调治疯狂,凡初来之疯妇,一见即贴服。每当病发,跳号骂詈,无所不至,女士一到,则安然无事,电力所制,洵有伏虎降狮本领。

她作为外科医生的表现,也有以下的记述:

朱姓小儿才周岁,误吞簪花铁针,针长二寸,一头尖、一头圆。幸圆头在下,尖头在上。自咽而下,入于胃脘,不甚痛楚。其父母惶急,乃诣医院求治。张女士先令食韭菜及煮熟山芋,使芋筋韭菜将针头裹住,然后服药送下,将儿直抱,不令横眠。越二日,针从大便下,所裹芋筋韭菜犹在,儿无所苦。举家欢忭感谢。今此针留为纪念。

征信录是公益事业的会计报告书,对于善会善堂史的研究来说是不可欠缺的。本书也多处引用征信录的内容,为叙述增色,这在前面已经提及。但是,征信录所告诉我们的,不仅是公益事业的事业会计报告。正如前面所叙述的那样,在上海编纂的一本征信录,不仅对于研究上海市的历史来说是无法替代的,而且是让张竹君这样富有魅力的人物在我们面前更加展现出魅力的史料。在治疗中使用芋筋韭菜,恐怕不是张竹君从西洋医学中学来

的,而是根植于中国的传统医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对于研究中国医疗史来说,这本征信录也是不可替代的史料。

本书的作者小浜正子于198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她的研究课题也与我的接近。因此虽然我并非上海史的专家,但是在本书中文版即将问世时她仍请我来作序。我从内心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感到高兴。当我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不禁十分感怀1984年在上海博物馆昏暗的一室内阅读《上海医院第一征信书》的时光。我也十分怀念上海博物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及上海图书馆的各位同仁,从内心感谢诸位在资料收集工作上对我的帮助。

我在此介绍这一史料,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作为公共医疗机构,上海医院在继承善堂的基础上,继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上海医院确实是一家近代化的医疗机构;小浜正子有效地使用了一系列的征信录史料并取得了成果;近代女医生张竹君的事迹在此得到了介绍;以及本书的作者同为女性。因此我认为这段史料的介绍对于小浜正子著作的中文版序言是很合适的。我真心希望包括小浜正子在内的上海史研究专家、各位同仁今后继续努力致力于与中国历史有关的重要的上海史料的发掘、介绍和刊行,以此为序。

夫马进

2002年8月23日

注:夫马进博士现为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因其主要著作『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同朋社,1999年)于1999年被授予日本恩赐赏、学士院赏。

致中文版读者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熊月之所长的直接关心之下,经由同研究所葛涛的准确、流畅的翻译,拙著《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的中文版问世了。对于拙著当初在日本能够出版,我已经深感幸运;而对于中文版的问世,则更是喜出望外。值此出版之际,谨向以熊所长为首的有关各方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研究的是作为外国历史的上海史,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实利并非我的研究目的。能让足以留在历史记录上的往事更为清晰,并能使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更进一步的话,我就感到满足。这是否算是间接地为当今社会做了贡献,就留给后人判断吧。

尽管如此,但对于我的研究对象即近代上海人的后代,以及在我的研究进程中给予莫大帮助的当代上海人来说,我强烈地感受到,不能使自己的工作成为无意义的事。作为本书基础内容的一部分研究成果,此前已由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何凤圆女士以及同历史研究所的陈祖恩先生翻译成中文发表,中国朋友们从与我不同的角度出发,作出响应,表达了他们对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关心。随着本书中文版的问世,我期待着能够展开更进一步的讨论,探讨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发行的《史林》杂志于2001年第1期刊登了本书译者葛涛介绍本书的文章,除此之外,在日本也已经有了几篇相关的书评。其中吉泽诚一郎的书评*出自日本新一代学者之手,他在本书中读到了自己的有感之处,对于我也是一种学习。吉泽氏的尖锐评论包括了诸

多论点,在此对于他对本书“公共性”的评论,以及我本人对此的一些看法进行介绍,并希望与中文版的读者们就此展开讨论。

吉泽氏认为本书的“公共性”没有(a)“以不同立场、意见的并存为前提进行讨论的场合”的含义,而是(b)“以社会一元化的共同意识、一体感为前提,谋求社会全体的利益的理念”。他认为公共性的概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本书叙述的公共性属于(b)的范畴,他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对此也表示首肯。

但是,我不认为公共性的两方面内容就完全不同。当多样的人群集结在一个共通的场合时,公共性(a)重视彼此间的差异,公共性(b)则重视人们的共通性,两者看似都是维持、统合社会全体的装置。即公共性的两方面内容实际上是不同的人在一起时更注重彼此间的差异或是共通性的问题,也就是认识视角倾向上的差异。

只是,公共性(a)首先使人想起的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由“议论的公众”形成的公共领域。而在中国史中讨论“公共领域”的时候,在兰金、罗尔、夫马进等人的研究中所论述的,当属(b)的范围,本书也与此相连。这主要是由于在中国,与差异性相对而言人们在集团中的共通性更加得到强调,显示了社会统合的志向。

吉泽氏认为,本书所描述的在民国前期为了社会而自发尽力的上海市民身上体现出的公共性,是近代中国人们的现实感觉与理想意识的产物。当时的人们也洞察到如果充斥了只主张自我利益的人,那么世间也就无法维持和继续下去了,为此在个别的利害与全体的福祉之间努力寻求平衡。本书所描述的民国时期上海人的活动,是他们努力用实际行动对政治思想史的古典问题做出的回答。我对吉泽氏将本书已经明确的问题放在一个大的问题设定中感到高兴。

他在对本书所描述的公共性寄予了很大关心的同时,对以下的问题感觉到了疑问。即自发的志愿活动与动员志愿活动应怎样区别?当意识到主动地支撑社会是作为社会成员的职责的时候,公共性成为动员人们的理念,自发性与义务是否会成为相同的东西?吉泽氏认为如果改变这种公共性所具有的公共福祉的内容,是很容易使其为国家建设、抗日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服务的,对于社会主义体制也具有一定的亲和性。我认为,他从这种公共性中能够感受到为了全体利益而压制个人自由的危险。

他认为,重视全体利益的公共性(b)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得到了继承,因而对我“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为何没有得到继承”的疑问进行了批判。这其

中存在着误读。我同意人民共和国下的公共性属于(b)的范畴,可是主要的承担者已经不是地方精英即资本家阶级,而是党指导下的人民。我提出的疑问是:以地方精英为主要承担者,具有自明清以来善举传统的历史背景的公共性,为什么会被中国共产党指导的公共性所取代?通过对话,民国时期的公共性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性之间,哪些部分得到了继承,又在哪里出现了断绝,变得明晰起来。

吉泽氏指出的,属于所谓公共性(b)范畴的中国的公共性存在的问题,在夫马进关于清代善堂的研究中已经被指出了(参见本书序章)。夫马进对于以民间人的自发结社经营公共事业的善会、善堂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得到内在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有一点也很清楚,原本为民间自发事业的善举,有时会转化为类似徭役的东西。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认为可以明确的是:中国的公共性的结构与问题点,在于它是“以社会一元化的共同意识、一体感为前提,谋求社会全体的利益”,自发与强制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应该如何解答这个问题呢?如果能够与本书中文版的读者一起探寻答案,或者使问题本身“脱构筑”,将是令人感到高兴的。

值此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能够请到熊月之所长和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为之作序,我感到非常荣幸。众所周知,这两位是分别在与本书共同感兴趣的诸多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的、令人景仰的学界前辈。同时,对于我来说,他们与我最为接近的研究同仁、以古厩忠夫为首的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的成员一起,也是激励我进行这项研究的恩人。本书第三章的基本史料《上海救火联合会报告》,还是20世纪90年代前期历史研究所暂寓田林路时,在熊所长和罗苏文研究员的帮助下,我在资料室发现的。一开始我确信自己是最初关注这份史料的人,回到日本后,我方才了解到夫马进先生已于十年前发现了它。后来,我奔走于上海图书馆位于南京路和长乐路的书库,以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之间,发掘历年的救火联合会报告册,继续我的研究。我有幸首次得到机会发表我的研究成果是在199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的讨论会上。

以出版优质图书而著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工作,是又一件足以荣耀的事。中文版的内容与原书基本相同,只是在以下几点上存在差异:增加了原著所没有的“序言”、“致中文版读者”之外;删除了中文提要、英文提要以及索引;还增加了主要文献目录。此外,原著中[图0-2]使用“最新上海全埠地图(1925年)”,据此展示昔日上海的地区概况,而中文版则

采用了别的地图。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还在序章中添加了几处补注。

今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丁日初先生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杨立强先生相继辞世。十年前我在上海留学期间,他们两位与招聘人黄美真先生,都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人。作为研究资本家问题的先辈,两位以其广博的学识教授了我许多知识,丁先生、杨先生及其夫人还分别数次在家中招待我吃福建菜和广东菜,并介绍我认识了许多研究同行,有熊月之、罗苏文、陈祖恩、沈祖炜、张济顺、马长林、冯绍霆等。本书的中文版能够问世,是在这些先生引领下与中国的同行们十年来交流的结果,现在还增添了新的年轻朋友——本书的译者葛涛。我在此为丁先生与杨先生的冥福祈祷,并期望与阅读本书中文版的新朋旧友们进行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对话。

小浜正子

2002年8月

追记

自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创立以来一直担任会长的新泻大学教授古厩忠夫氏,因癌症再发,于2003年2月28日逝世,从而结束了与病魔长期斗争的历史,享年61岁。正如我在“后记”中所叙述的那样,古厩氏不仅领导着这项研究工作,对本书的问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受聘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开拓了与上海学者之间进行长期交流的途径,本书中文版能够问世也受益于此。继痛失丁先生、杨先生之后,对于古厩氏的辞世,我感到无限悲哀。对于我们的研究会而言,他可以说是无法替代的存在。谨将本书中文版敬献于丁先生、杨先生、古厩氏的灵前,并为他们的冥福而祈祷。

* 登载于『東洋史研究』第60卷第2号,2001年。吉泽诚一郎博士现为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助教授,不久前他关于天津近代都市社会史的大作——『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の政治文化と社會統合』得以出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这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著作,我希望该书的中文版能够在不久的将来问世。